

学术启程、人文关怀与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专访黄锦珠教授

访谈人：许美薇（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受访人：黄锦珠教授（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暨研究所退休教授）

日期：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地点：马来西亚瓜拉雪兰莪



图 1 黄锦珠教授（右）二零二五年于瓜拉雪兰莪接受许美薇访谈。

一、前言

黄锦珠教授生于台湾嘉义，学士与硕士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于国立台湾大学取得。她曾在《文讯》杂志社担任主编、任教于国立台北师范学院语文教育学系（今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言与创作学系）、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暨研究所，二零二五年自国立中正大学荣休。投身于学术三十余年，黄教授研究范围广阔，专长领域包括吴梅村叙事诗、古典小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近现代小说与妇女文学研究，曾撰写，编辑并出版多本专业书，包括《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1995）、《明清小说·清代卷》（1997）、《晚清小说中的新

女性研究》(2005)、《吴梅村叙事诗研究》(2008)、《女性书写的多元呈现：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说研究》(2014)，合著有《文学概论》(2009)。

黄教授自国立中正大学退休前，从毕生藏书挑选出约三千五百册，赠送给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与马来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以支持教学与研究，丰富学术馆藏。与此同时，黄教授与汉学研究中心一起来访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首次在这座南国以南的半岛主讲两场关于晚清妇女研究的讲座。学者退休是一个学术生涯的阶段性结束，再加上黄教授在近代文学还未成热潮之时便已留心此领域，发展独到的论述，她的个人经验、学术经验和心得必然有值得分享的地方。值此黄教授来马的机会，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张惠思博士与我同黄教授洽谈专访事宜，获得首肯后，相约于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到瓜拉雪兰莪小游时见面访问。当天黄教授、马来亚大学研究生学会主席李嘉慧、马来亚大学硕士研究生黄玉琴与我一同自吉隆坡驱车北上这座沿海城镇。午后艳阳高挂，城镇炽热，大海退潮后店屋下方露出附着的藤壶。我们坐定于一一八八天空咖啡厅，在细碎的人声中开始了访谈。

二、学术历程的开端与确立

许美薇

老师在哪个阶段决定把学术当做终生的事业，是什么样的契机触发了这个决定？

黄锦珠

一开始念研究生硕士班时，我对学术这个行业是一知半解的。我在硕士班第四年才开始正式写论文，一开始我就对小说感兴趣，那个年代小说的资料非常少，吴宏一老师就建议我做吴梅村叙事诗。我虽然研究诗，但因为它属于叙事文类的诗体，就用了研究小说的方法来写硕士论文。写硕士论文的过程是我觉得非常充实和愉快的经验。对我来说，写论文、找资料不辛苦，跑来跑去也不会觉得累。譬如我到嘉兴图书馆找邵振华夫家年谱时，那时候只能用纸本地图想办法找到火车站路线、找图书馆的位置，最后成功进到嘉兴图书馆就好愉快。能够把学术当做终身事业其实跟我的考运有关。那时代台湾的博士生人数很少，一年只有二十

来个名额，我很幸运在二十七岁考进了博士班，跟苏老泉（苏洵）发奋读书一样的年纪。考进博班后，我觉得不能再像硕士班那样悠哉游哉，博士生的名额这么珍贵，我就要好好地完成我的博士学业。我在博士班的时候除了上课，一个礼拜至少半天或一天会泡在研究生图书馆阅读有兴趣的学术文章。那时候台大研究生图书馆只提供给研究生，人数很少，非常安静，整座图书馆像是我的书房一样。图书馆所有的学术期刊、新书都是开架的，假如要查阅一些比较珍贵的线装书或是某一些早期出版的书，只需要填个单子，馆员就会从书库里拿出来。那段泡研究生图书馆的日子让我觉得很愉快，既然已经进了博士班，自然而然地就走上了学术这条路。

许美薇

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是否更加坚定了您从事学术研究的选择？

黄锦珠

的确是。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第二年我修了一门清代文学专题课，既然已知论文要做晚清小说的议题，那门课便选择了以晚清做为学期报告。资料一找，才发现台湾关于晚清的资料非常贫乏，几乎是没有的。修完学分后，我开始规划去外地找资料，那个时候刚刚解严，两岸还没完全开放，香港是找资料最方便的地方。当时我的博士指导教授吴宏一先生刚好从香港任教回来，建议我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找资料。我去冯平山图书馆的时候，单凭系办公室的一张公函，没有任何介绍。那个年代香港会讲中文（普通话）的人非常少，广东话跟英文是他们最常用的语言，但广东话我几乎听不懂，所以我去到那那里也没有馆员能跟我沟通，最后找到一位组长来。我在那边花了五天，一本一本地毯式搜寻，那一批资料后来都变成我的私人收藏，我写的论文、引用的资料，台湾当时几乎是没有的。

博士班撰写论文期间我在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担任临时研究助理，朝九晚五，下班后吃晚餐、散步，大致上休息一下，大约晚上七、八点就坐在办公桌开始写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助理办公室写的，从晚上七、八点写到大约凌晨一点，然后在办公室架一张行军床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起来梳洗，九点上班，回想起来还有很多趣味。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已经更清楚了解自己的兴趣还有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时候没有电脑，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只要书、稿稿

纸、笔摆在桌子上，我可以一整天都不厌倦。因为没经过尝试，我也很意外自己会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只要有东西读、可以写，我的日子就很充实、很安心。对我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确是一个很重要、很愉快的过程。很幸运的是，教书是我的兴趣，写论文也是我的兴趣。虽然写论文的兴趣发掘得很晚，可是当我决心走上这条路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或者痛苦的成分。

许美薇

有过挣扎的时候吗？

黄锦珠

博二、博三修完学分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点点挣扎。那时候修完学分要准备写论文，有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也就开始去外面兼职。当时我曾在杂志社工作半年，《文讯》杂志社是以为文学服务为目的，会去采访作家、刊登作家近期活动、创作构思等，也会针对台湾文坛提出一些评论或者建议。我在杂志社工作的那个阶段因为接触到比较多作家，曾经有过一点点思考——我要不要走创作路线？其实在大学时期到硕士学业完成之前，我有过陆陆续续的创作经验，文章在班刊、系刊、报纸都刊登过。博士班前两年的时候，写文章投稿赚稿费也是我的一个经济来源。但后来我觉得走文学创作这条路的心情起伏会很大，写小说尤其是。写小说的时候因为要揣摩小说中的不同人物的性格跟心理状态，常常需要把自己代入到角色里，因此心情的起伏是比较强烈的。可是做学术研究心情很平衡，而且要维持客观。创作经验跟写论文经验比较下来之后，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客观理性的那种心境，后来当我决定论文的题目之后，经过思考，就决定放弃文学创作，我最后的文学作品就是在博士班的时候写的，后面就几乎没有再写过了。人的精力有限，因为要专心于学术，只好把那个部分割舍掉。

许美薇

一九八七年刊登在《国立编译馆馆刊》的〈“清凉山赞佛诗四首”疏证〉是您的第一篇论文？是否隐含了后续妇女文学研究的雏形？

黄锦珠

我进入博士班之后，课堂上老师就说，你们硕士毕业了，那硕士论文有没有

可以单独拿出来发表的文章。那时候《国立编译馆馆刊》在征稿，老师们也都鼓励我去发表，所以我就从我的硕士论文里面挑了第六章的其中一节单独去发表。

“清凉山赞佛诗四首”是吴梅村叙事诗里面的其中一组，四首是同一个题材。我会选择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涉及到清顺治皇帝跟董鄂妃的皇宫故事，民间很多传说把董鄂妃说成董小宛，董小宛是明末冒辟疆（冒襄）的小妾。她，包括陈圆圆，是明末四大名妓之一。那董小宛跟陈圆圆的故事吴梅村都写到了。明朝灭亡与流寇有关，是流寇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上吊自杀，所以明朝灭亡了。可是清兵入山海关才真的造成中原易主，清兵进来之后，流寇也打不过他们。流寇是由民众聚集起来的，可是清兵是经过大金王朝有体系训练的国家军队，清兵入关之后就把流寇赶走了，而且不断的往江南推进，最后统一中原。“清凉山赞佛诗”值得发表，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关于清顺治跟董鄂妃的故事，一些历史学者也做了相关的考证，我配合历史学者的考证把这四首诗所说的故事理清楚一点，并且证明这里面的董鄂妃，跟四大名妓董小宛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时候我还未注意到妇女文学。

许美薇

提到研讨会，您第一次参加研讨会是在台湾？印象最深刻的研讨会是怎么样的呢？

黄锦珠

我第一次参与研讨会是硕士班时期，那时候台湾刚刚开始有人办研讨会，但我已经不太记得研讨会的题目和我的发言内容了。那一次在研讨会上我就发现研讨会论文有好有坏，同一场里面可能有好的学者，文章有内容，言之有物；也有不好的学者，文章不知所云。这就不得不提到夏晓虹了。我在台湾所参加过的研讨会里面，近代研究阵容最完整最精要的，就是夏晓虹背后操刀筹画，二零一五年花莲慈济大学主办的“五四精神在东亚的发展与变迁暨跨文化研究”研讨会。我就是在那个研讨会上认识许德发与张惠思，夏晓虹跟陈平原也都在。那一次研讨会汇集了台湾做近代文学重要的人，高嘉谦、梅家玲、吕文翠、胡晓真，那时候颜健富还没毕业，所以没参加，现在他已经变成很多研讨会的主办者。学者名单是夏晓虹开的，阵容很漂亮，非常整齐。陈平原在“五四”九十周年召开过一

次“五四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三天，从清末开始谈到五四。那一次的印象也蛮深刻的，有很多海外学者参与，那个时候也认识了钱南秀。会议时刚好是春天，就看见了北大春天的花和柳絮，台湾的柳树开花不明显，在台湾是在见不到柳絮的样子的。结果那一次去了北京，所有的柳树都开花，上面白白的一片，风一吹空气中就充满了柳絮。夏晓虹老师很害怕，因为她会过敏，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我第一次去大陆是二零零九年的“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二零零九以后超过十年的时间，几乎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反正只要近代文学学会举办的小说研讨会我几乎都会去，一直到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疫情的那段时间为止。第一次去欧美参加的研讨会则是二零一四年的第二十届欧洲汉学学会双年会（The 20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那次才真的让我打开了对于西方国家的视野。

许美薇

刚才您提到早在博士二年级时就确定了研究晚清想法，为何会对晚清感兴趣？

黄锦珠

这个也是跟硕士论文有关。我硕士论文处理的吴梅村是明末清初人，他的叙事诗讲了很多战乱中的人物故事，也记录了很重要的明末历史事件。为了了解他诗歌的内容，我几乎读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明末的正史、野史，大事小事都要想办法找到。我发现这个历史的变化很有趣，而且跟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变化，和明末清初有相似的地方。我在跟我的指导教授吴宏一老师讨论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还是觉得想研究明清小说。当时网络不发达，曹雪芹《红楼梦》的资料并没有更多，对新领域的开拓颇有挑战；名著也都被很多人研究过，当时也缺乏新的资料。所以当老师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研究题目时，我提到了阅读时无意间看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老师说这个可以，就先定了这个方向。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小说界革命是什么，我只是无意间看到。梁启超、《新民丛报》都是我们熟知的，但是小说界革命是什么呢？我是不知道的。那课题敲定了，就要思考题目与大纲，当我准备好章节大纲和参考书目去给老师看的时候，老师认为“革命”两字太敏感，便帮我把论文题目稍微修改了一下，成为现在的《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了。

博士毕业之后第一年，恰巧国立编译馆在征求学术书籍书稿，我拿了博士论文去投，编译馆通过了，还给了解审意见。到现在为止，那本书稿的稿费是最丰厚的，稿费按字计算，一次性付清。我的博士论文写了二十几万字，编译馆一个字算五毛钱，所以我拿了十几万的稿费。那个时代我在当副教授，获得的稿费几乎是我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收入，最重要的就是也得到了官方出版机构的出版认可。《晚清时期小说观念之转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

三、始于“五四才有女小说家吗？”的好奇——黄锦珠与其文学关怀

许美薇

看来吴梅村叙事诗可以视为您研究的一个开端。从吴梅村叙事诗研究开始，您后来涉及明清小说研究，直至现在的妇女文学研究。这些研究课题之间的跨越是否有一些关键的事件相连？

黄锦珠

表面看起来是跨越，其实藏在里面有一个始终不变，从一而终的内因——那就是小说。我用了分析小说的技法研究叙事诗；到了博士论文的小说界革命，其实也是需要阅读小说，只不过同时得兼具小说作品和理论。那个时候晚清小说相关的书很少，主要有一套三十七册的《晚清小说大系》，另外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集的“四大小说杂志”。因为想更了解晚清小说，我接触了小说杂志，无形中涉及到了报刊研究。那无论是别的小说杂志或“四大小说杂志”，在刊登小说作品时会同时看见作者署名。虽然很多是笔名，还是会不时在笔名中出现“女士”的字样，像“震旦女士自由花”等，只是那时候我的目标在小说，就没有去管作者性别。

后来晚清小说读得差不多了，大陆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出版，我也差不多全部都读完。我主要阅读一八九五年以后的小说。一八九五年开始到一九零二年間小说的写法虽然仍保留传统，却已经加入了一些时代事件。一九零二年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一喊，小说的写法与内容就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了解小说发展后，也比较能够具体感受到变化的实际状况，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女士”变得越来越多。后来，我读到了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

研究》，序言里强调，女作家是在五四开始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在此之前中国文学史记录的女作家实在太少，而且完全没有女小说家的出现。我那时候读了很多部晚清小说，也发现很多含“女士”的笔名，这引发了我的思考：“真的五四才有女小说家吗？难道五四之前没有吗？”虽然我尚未考察生平，但脑中很快浮现以女士做为笔名的小说作者。这成为我那时候的一个疑问。

写《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时我读到了《侠义佳人》，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女人写的。小说里描写的缠脚过程，有脓血、脚趾头断掉……这种细节男人不会注意，只有女人自己知道。女人在洗自己的裹脚布时，很可能会粘上血迹，不只是脚臭，还会别发炎溃烂的恶臭，必然是女人才有这种经验。男人只看得见缠得好好的、小小的指尖，穿着漂亮绣花鞋的外型，缠脚的过程男人是完全没有参与的，不是妈妈帮女儿缠就是婆婆帮媳妇缠，男人怎么会知道裹脚布里面的脚长得如何。这都是女人的世界。另一个例子是现存最早的女作家小说《红楼梦影》。其中让我感兴趣的也是生产过程部分的描写。古代男人从来不进产房，生产都是只有女人，包括稳婆、产妇、负责照顾的丫鬟、婆妇等通通都是女人。男人都离产房远远的，谁还会去管胎盘长什么样子呢。但是，《红楼梦影》写到了生产过程的胞衣¹，一定只有女人才写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侠义佳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既然没人做，那我来做做看吧！我开始从各式各样的渠道找晚清女小说家的生平，有报刊、家谱等等。

许美薇

您通过什么办法印证《侠义佳人》缺失的作者资料？

黄锦珠

我前两天在讲座²里谈过，最早引起邵振华线索的是胡适。胡适在文章里提过《侠义佳人》作者邵振华，包括她是谁的儿媳妇、太太等，我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在台湾图书馆找到她公公（劳乃宣）的年谱，从年谱里发现同样的记录。邵振华的先生是一位数学家，倒是我后来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读秀）《数学

¹ 现指胎盘。

² 黄锦珠教授于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假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进行《“新女性”的异面：晚清男女作家小说的不同呈现》讲座，谈及晚清男性小说家与女性小说家文本中的写作手法与内容差异。主要涉及文本包括震旦女士自由花（张肇桐）《自由结婚》（1903）、顾琐（汤宝荣）《黄绣球》（1907）、思绮斋（詹塏）《女子权》（1907）、王妙如《女狱花》（1904）、黄翠凝《姊妹花》（1908）、绩溪问渔女史（邵振华）《侠义佳人》（1909-1911）。

家大辞典》找到的。通过各种资料，就可以印证邵振华这个人确实存在。我在摩门教会的藏书中发现邵振华爸爸（邵作舟）的文集，文集里面虽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邵振华的事迹，但可以得知她爸爸非常开明，也支持维新。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女权主张是废缠足、兴女学，《侠义佳人》里写缠足、写很多女学的故事，包括办女学或女学生的遭遇。邵振华对于妇女权益这么重视，基本上也有家庭的影响。

《侠义佳人》既配合了时代的呼声，也呈现邵振华做为女人所关注到的议题。序言里写，小说有很多是作者的见闻，是女人所看见关于女人遭遇与处境。《侠义佳人》中许多人物的反应是妇女真正的、确实的感受，和男作家写的不一样。在男作家的想象中有些事情很容易可以完成，可是在女作家的处境里是很困难的，女人要走出去——“走出闺阁”——这四个字就花了好几十年才终于走出去。这对本来就在外行走的男作家而言不是什么特别的状况，他们觉得女人走出来很容易。但对女人来说有很多无形的束缚，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理上有很多束缚，也需要考虑很多社会的观感。以男女交际做为例子，从男人的立场而言，在座有女人、跟女人发生语言或肢体的拉扯动作，对他一点损伤都没有。但这对刚要突破男女大防的妇女而言，拉一下，要命耶！袁贞娘就为了被换衣服而要嫁给邓述宇³，这才是那个时代的妇女处境。女人会知道嫁给一个人是一辈子，和男人娶个太太回家不一样。男人的事业、生活重心还在外面，婚姻对他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可是对女人而言，进到一个家庭就是一辈子的生活空间，如果这个男人和她志向不合，她没办法接受家庭的风气，那一生的影响。这两种观感真的很不一样。妇女文学就是需要把这些妇女的处境、幽微的心思写出来。

许美薇

从一个“五四才有女小说家吗？”的叩问开始，您的清末民初女作家研究几乎填补了近代文学中关于女性声音的空白。从您的论述中发现，您透过关注妇女的生平、透过“其人其事”的研究路径，系统化地还原了晚清被边缘化的一些知识妇女群像，也挖掘出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个体的声音。《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里提到，由于晚清女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她们的印记、文字也乏人问

³ 出自思绮斋（詹塏）《女子权》（1907年）。

津。在史料的考掘上，面对生平印记逐渐消退的知识妇女，是否有更多可以分享的研究心得？

黄锦珠

最难的就是怎样突破“没有”的困境，怎么样找都找不到的情况下，还要想方设法。以黄翠凝为例，我大概只掌握了她十年的生平轨迹。黄翠凝是寡妇，她带着儿子张其纫来上海谋生，她从事写作、小说翻译，张其纫则在上海求学。所幸黄翠凝每一次发表文章都以真实姓名署名，包括“翠凝女士”、“黄翠凝女士”，或加上籍贯的“番禺女士黄翠凝”、“番禺黄翠凝女士”、“番禺黄翠凝”等。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杂志都有刊登她的作品。黄翠凝的事迹会留下来还得靠她儿子，那时候包天笑主编《小说林》，他看见一位十三岁的年轻小孩来送稿，其中有一篇《两头蛇》还是这个小孩翻译的稿件。包天笑便为这篇稿子写了篇关于母子投稿简述的后记，大意是某个很热的夏天，发现有个年轻的小孩送稿件来，一看原来是黄翠凝女士的儿子。另外，张其纫也在序言提及他在上海念书，是一名孤苦的穷学生，依赖妈妈十指为生，利用暑假写稿赚学费的事迹。通过这些序文、后记，就会发现黄翠凝的婚姻状态、收入来源等。我刻意查过一九零七年左右上海的生活水平，根据樽本照雄的研究结果分成三个等级：一般最便宜的十五块钱可以过一个月，但生活很拮据；稍微好一点是四十块；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有钱官员们就有一百二十块。根据当时一般的稿费标准，那黄翠凝十年的稿费是勉强可以维持生活的，这也侧面印证张其纫说在暑假翻译稿子帮补学费的说法。

后来，张其纫在黄翠凝的影响之下成为了小说家和翻译家。有一段时期张其纫从事大量的小说翻译与写作，这是他最主要的经济收入。不过，张其纫也是个被忽略的旧派小说家，他的作品大多集中在民国初年，那时候很快就进入到五四运动，白话文学作家备受瞩目。大陆河南大学的郭浩帆留意到他，还为张其纫写了好几篇文章。晚清小说家、晚清小说文坛其实还有很多尚未被挖掘的地方，除了因为晚清各式各样的资料、作品太多，也有被传统文学观念影响的原因。近代这一块的专业很常是缺失的，上课时古代没讲到近代，讲现当代只管一九一九以后，那一八四零到一九一九就变成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页。河南大学是最早开设近代文学课程的，由河南大学的关爱和提倡。后面他们虽然成立了近代文学学会，

但倘若在学校里没有近代文学这门课，学生不了解便不会投入研究，这也是近代文学的一个困境。

许美薇

老师举例的两个个案，一位可以从社会网络的方法去了解，另一位则可通过出版路径去获得她的个人事迹，这不仅能够详细地识别知识妇女当时的情况，也重构了她们的创作背景，进而相互印证。晚清的妇女书写呈现了一种历史的无意识的情况，指涉了晚清女作家小说文本里那些没有被作者明确表达，却承载时代集体意识的隐性内容。想问问老师，文学除了反映时代，也是个体的发声的路径。您在解读妇女小说时如何区别个人心里的“作者的无意识”和集体结构的“集体无意识”呢？妇女的心理怎么在未被言说的情况下说出来？

黄锦珠

“无意识”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分析学，在文学批评的语境中，是透过作品内容去挖掘里面所潜藏的无意识。以《侠义佳人》为例，那时候整个中国妇女界都很黑暗，妇女受到很多的压抑，针对这点，邵振华提出了两个理由，其一是骂自己、其二是骂女界。过去的女孩在提倡顺从的教育期待下无法随意自己提出意见，更因为从小没有学习解决问题的办法，遇到事情畏畏缩缩，不敢出面。放置到当代戏剧，其实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故事的男女主角经历了一些事情，女主角只能哭，然后依赖男主角来解决问题。这其实还是反映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事实。邵振华在意识层面认为女界是黑暗的，妇女权益不公，然而对她而言这是妇女自己的问题，需要靠妇女去振作起来。她一方面责骂自己，觉得是妇女做错事；另外一方面又要妇女自己来改正，完全没想到是社会或其他的问题。如今有了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妇女的局面并非个人问题，而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宗教教育，整个社会化过程对妇女从内而外的塑造。因此，妇女在小说中表现出胆小如鼠的形态并非她本身的个性，而是社会期待的结果——这是邵振华不知道的。在《侠义佳人》里面，邵振华写到很多旧式妇女表现不敢说、不敢做的形态，是她自己无意识地自我歧视，这是属于她个人的。

关于“集体无意识”就是我在演讲所提到的“关怀”。邵振华觉得妇女做错

了事，应该要改进，可是靠女人的力量如何去改进呢？事实上，是没有社会资源让女人站出来的。邵振华在《侠义佳人》里面设计了一个名叫晓光会的组织，晓光会的名字来源于破晓，虽然如晨曦只有一点点光，可她希望这一点光是照亮妇女的开始。晓光会的成员会到处去演说启发，把新观念带给广大妇女，然后尝试把被迫害、被婚姻诈骗、被家族虐待的弱势妇女拯救出来，让她们拥有独立自主的机会。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对弱势妇女的社会关怀，也是邵振华所理解的行侠仗义。当我们今天有了新理论，就会知道这符合女性主义哲学所说的“关怀伦理学”。女性主义哲学所提出的关怀与分享是想尝试取代父权社会以正义做为标准价值观的法律准则，而正义，正是与行侠仗义价值观相近的东西。《侠义佳人》题目虽然提到行侠仗义，内容的表达反而较接近“关怀伦理学”所强调的关怀与分享。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过去的社会分工里妇女长期负责照顾、维护、保护弱小，所以在面对弱势族群与处于劣势处境的其他妇女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照顾者的本色。正义原则的运作方式是做错了事要受罚，但《侠义佳人》对受害者则展露了一种拯救与给予新生的机会。那个时代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这是什么，而今天我们就会知道，这运作模式是属于女性主义哲学所强调的关怀。这些是她们不知道的，也是妇女潜意识中共有的特殊能力。

四、人的关怀与人文学研究

许美薇

您提到的关怀伦理学与《侠义佳人》妇女群体无意识流露出的关怀，其实会让我联想到关于关注个体生命经验的部分，或者说是一种回归到最初的人的关怀的体现。您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人为研究中心的研究路径，也注重个案的生命经验与历史语境。然而如今人文学研究同时面临着诸多改变，包括研究理论化、数字人文分析、量化分析等等方法的趋向，这类方法是否会导致文字失去人性化的解读？

黄锦珠

其实这个在其他学科应该也遇到过，简单说就是量化研究跟质性研究的区别。数字人文或量化分析要解决的问题，与以人为中心所进行的个别研究还是有

点不同，两者各有所长。过去在没有数字化工具帮忙的情况下，一个人最好做的就是以个体为中心，然后找到一群人，再以这一群人作为中心去讨论。以妇女文学史为例子，就是以妇女作家群体为中心。可是，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只有妇女会做，社会化的过程虽然让女人与男人产生了很多差异，但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成长的人，如果有作品产生，那应该会有相同的质素在里面。为了获得这一时代共有的“质素”，我们需要大量资料去进行佐证，量化研究就是想办法做这件事。得力于这些量化的工具，我们可以更快速地确认这个时代里的一千万人是否同时具备这个时代共同的“质素”。

台湾最有名的数字人文研究者是国立政治大学金观涛，他最有说服力且最常被引用的成就是中国从天下观转变到万国观的研究。这一用词的转变代表了中国认识世界的开端，中国的天下观是以中原为整个地域中心的地理范围认知，中原之外都是臣服的藩属国。因此，当中原遭遇西方列强入侵节节败退时，对中国人是很大的打击，这也带动了地理变化。中国很晚才接受地圆说，当他们接受新的说法、认识到地球还有除了中原与藩属国的国家时，也会遭受到存在更强盛国的冲击。晚清语境里，欧美、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都是强国，可是印度、非洲就是与中国一样弱的。国立清华大学颜健富提到，晚清小说对于印度、非洲的描述与想象大多与中国一样弱，或者更甚。所以小说中经常以非洲与印度作为负面教材，呼吁中国人要自强，否则就会与两国一样。而以数字人文通过大量词汇分析的数据作为论证，世界观的变化显然更有说服力。

至于量化分析，它要解决的问题与质性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处理个别或一群人的研究，希望认识作家作品特色与个别作家的区别，就要实际去阅读文本、做文本细读。此外，还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包括家学背景、社会环境、生平经历，如此才有办法知道他为何创作出一部作品，这些无法通过数据分析达成。以吴梅村为例，他的叙事诗集中在流寇作乱、清兵入关的明朝末年，那个时候许多人在战争的过程里牺牲了，老百姓流离失所。吴梅村以人为单位，写成了很长的歌行体叙事诗，如此才没有篇幅限制，来得及把故事说完。数字人文或量化研究可以辅佐文本细读，而人性化的解读永远是人文学研究的根本。

许美薇

您认为这种以人为本的研究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人文学价值如何体现？

黄锦珠

其实这种问题在台湾也很多人问，特别是刚刚进入中文系的大一。他们都觉得读文学做什么，好像没什么实用性？那所谓的实用性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定义。我觉得人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项是情感教育。今天很多学科的分类都是物质文明的分类，许多科学知识都是物质文明的知识，可是生活中除了物质文明之外也需要精神文明。对于现在的精神文明，有些人还是会追忆西方，追忆到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东方呢？中国的精神文明从哪里来？儒家思想诚然是很重要的精神文明，可是儒家思想是在理性、道德这方面。至于感情的表达呢？人类从小先体会的是亲情，母爱、父爱、手足情……这份亲情是支撑我们长大生活的重要力量。但如果在不幸的家庭长大，那孩子不是就有很多心理问题吗？童年阴影现在成为心理学上最大的心理疾病来源，这就是情的问题。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专科专门指导情感的教育，也只有通过中文系的文学阅读，我们才在过程中不知不觉接受到情感的熏陶。

我们考大学分科之前，国文教育是必修的一个过程，但中学阶段的国文教育强调语文，情感式的或更深入的文学分析基本上没有。到了大学后除了有情感教育之外，还有的是对于生命的反思。我个人的成长经验与其说是来自于家庭，不如说来自于书本，很多对人生的思考或者对情感的认知和向往都来自阅读。我在大学阶段有非常要好的同学，我们班感情很好，现在开同学会开得最多的就是大学的同学会。但影响我最大的是硕士班的同学，有一两位同学对我的照顾让我终生难忘，让我了解原来一个人可以如此照顾人。如果没有这些经验，没办法想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可以有多深，照顾一个人可以到什么层次。当有了这些经验，阅读时无形中也有了一个实际的参照物，书本的许多描写就可以具象化。阅读可以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就会分辨真实与想象。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支撑个体生命很重要的元素，只是我们今天因为没办法可视化、具象化，所以常常忽略了。这样一忽略的结果就是现在社会很多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淡漠。我做女作家研究的阶段时妈妈过世，心里面像是突然间空了一个大洞，我要感谢这些女作家，她们陪我度过

妈妈过世之后好几年难熬的时间。我和妈妈的感情非常亲近，我是她的第一个小孩。妈妈没有其他的阅读管道，她在生活上遇到什么不愉快和委屈就只能跟我说，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回到嘉义我都还是妈妈最佳的聊天对象。我们有很多这种母女之间的交流，这种感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文学阅读让我的情感经历得到验证与落实，文学文本承载了许多情感，这是其他文本无法取代的。

五、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学者退休之后

许美薇

学者退休标志着正式学术生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却不代表学术思考的终止。您目前已经从国立中正大学退休，时间安排应该也会与过往需要教学与研究的时候不同。请问退休后您在生活节奏上是否有很大的改变幅度？是否会尝试建立新的研究和生活节奏？

黄锦珠

我应该不会再做研究了，要换另外一种生活。我从小在乡野中成长，小时候我们在田里接触各式各样的生命，包括抓蜻蜓来玩、萤火虫在身边飞、摘草、摘花、扮家家酒、在树下荡秋千，都是在这种自然环境里面。即便到了现在外出，我还是比较容易被动植物吸引，比如我知道不要太靠近猴子，因为万一发生冲突牠会让你受伤，所以我会远观、欣赏牠。况且，不同的生命有各自的生长方式，不去干扰是最好的。我不养宠物，每一种我们把牠当宠物对待的动物，其实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空间，是因为人硬生生把牠们划到自己的生活范围里才变成宠物。正因为我对于生命的感知比较敏锐，轻易会感受到不同的生命脉动，所以我不太愿意去干预生物的生长。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许不是要去干预、破坏，而是要运用智慧去建立更好的生活，同时也让动、植物拥有合理的生活空间。

对我来说，研究只是生命的一部分，退休应该要过一些别的生活。六十岁的时候，我曾想学跳舞。我在大学时期是土风舞系队队员，大四那年获得土风舞比赛第一名，那跳舞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可惜现在年纪大了，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尝试身体的律动，但是唱歌还是可以的。我想，虽然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做不来，还是会有其他可以开发的地方吧。不管是什么，现在我还没有完全与学术活动切

割。那些审查要求严格的期刊还不愿意放过我，依旧需要进行许多审查工作。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唯一的优点是认真，要做就得好好做。以我研究的叙事诗为例，一开始我真的是一知半解，那没关系，中文资料找不到就找英文，逐字查阅，看不懂的英文资料就拿去英文研究所问。我认为学术研究或许只是我在职业生涯中所选择的一种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我很充实，教学的过程让我觉得很愉快，恰好我也喜欢。学术工作里面有三大区块，教学与研究是两大块，服务是另外第三大块。因为学术审查属于服务型的工作，因此虽然教学与研究结束了，审查还会一直下去。我唯一还想主动继续做的是写书评，写书评比写学术论文轻松多了，只针对一本书，三五天就可以写好。

许美薇

会有把过往的稿子全部出版成书的计划吗？

黄锦珠

说真的我没有。我唯一的遗憾是《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说集》没有完成，我收集了一百万字，也已经跟出版社谈好。第一校的纸本样本打印出来后，我一个人校不了一百万字，就找了好几位研究生一起来帮忙。虽然我告诉他们校对的格式需求，但回收之后还是发现每个人校的方式都不一样。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位有校对经验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纸本校对，转用电子文档。然而第三年对方完成校对交给我后，我发现还是没有达到我要的效果。我去美国访问的那一年，大概到了最后三个月，研究工作所需的资料都收集得差不多了，开始有一点空档，我就利用那段空档开始校对一部分。我希望能够做到印刷版和清末民初的原始排印版一样，包括字体字型都还原。一些古籍重新校点时会直接改用现在的通行字体，我觉得这样不负责任，比如说“因为”的“为”有两种写法，“为”是一种，是现在印刷最常用的；另一种是上面没有“爪”字的“爲”。因为这样，我做得非常慢，再加上本身又龟毛，最后也没校完，出版计划就暂时搁置了下来。但是，没校完就没校完吧，人生未完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就暂时这样吧。

许美薇

接续人生未完的话题，您持续关注着清末民初的女作家群体，晚近女作家研

究在经过您和其他学者的挖掘下已经处理了多少部分？还有多少是未完成的呢？

黄锦珠

我那本《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说集》里面选了将近二十位女作家，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处理完的，总数算起来大概是有三十来个。目前我已经退休，能否接续研究也需要取决于其他研究者的兴趣。那些清末民初的女作家不受到社会重视，的确不像五四以后的女作家这么受瞩目。当时我主要通过报刊找到这些女作家，她们的生平资料都可追溯报刊杂志。现在数据库有许多报刊的材料，很多女作家开始显现也是得力于数据库。邵振华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她的小说没在报刊发表，直接由商务印书馆印成书，单行出版。报刊上几乎没有邵振华的资料，所以我得跑到嘉兴去找年谱。我在报刊上找到的女作家有吕韵清，她另有一份未出刊的诗稿（收藏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然后还有高剑华、黄翠凝，陈撷芬、陈小翠……依赖的也是报刊。大部分女作家的资料可以在报刊上获得，有比较完整的生平事迹可以讨论。当然，虽然数据库很方便，可是查找的过程是很麻烦的。我需要用各式各样的关键字，一个一个筛选，再根据整体结构去挖掘其他线索。过程相当繁琐，需要有很大的耐心，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许美薇

最后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推荐做近代研究或明清女作家研究的一本必读书籍？有哪一本书是让您最为感动，可以一读再读的？

黄锦珠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没有办法是一本，可是有幾個人的书我一定会读，而且经常会一读再读。夏晓虹是第一个，我后来很多研究都有赖于夏晓虹的基础成果。她做了很久的妇女报刊，最早的《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到《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都是我书架上常备的。陈平原的书在博士阶段前后那几年常翻，因为写论文的需要，所以翻了很多遍，翻的最多的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后来开始做女作家就比较少接触他的作品。至于西方世界的论述，美国学者魏爱莲（Ellen Widmer），她编了一本《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这几个人的论著我都会留意。魏爱莲是因为重合度最高，我们都做晚清，经常会研究到相同的作家作品，她的看法常常跟我的不太一样。这是学者自己的想法，论点的问题，但是她的著作我一

定会看。季家珍做到民初，我很喜欢季家珍的东西，也会看。还有做报刊的德国学者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她后来做到离我比较远文革去了，但只要有翻译文章我还是会看。还有一位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汉学家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他基本上是以英文写作，中文口语说得很好。我们有很多相近的想法，经常在研讨会上互相声援。胡志德关注的范围比较宽，重视的是思想方面，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说的就是中国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我在讨论某一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个案或群体时，他的研究成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因为小说里面会反映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属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有了他的成果，我就不用再自己去做。